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学术部落及其领地

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



[英] 托尼·比彻 保罗·特罗勒尔/著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TONY BUCHER
PAUL TROWLER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TONY BUCHER PAUL TROWLER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TONY BUCHER
PAUL TROWLER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TONY BUCHER PAUL TROWLER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TONY BUCHER
PAUL TROWLER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TONY BUCHER PAUL TROWLER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本书基于透彻深入的文献研究和长期持续的实证调查，这使得本书堪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绝佳著作。

——伯顿·克拉克 (Burton R. Clark)

《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

本书是里程碑式的著作。高等教育的实践者和研究者都需要留意这部重要的富于洞察力的著作。

——阿兰·贝耶 (Alan E. Bayer)

《高等教育期刊》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本书是关于学科文化研究的突出的理论收获。所有高等教育的研究者都会从中获益。

——《泰晤士报教育增刊》 (*Times Education Supplement*)

本书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我相信本书会在今后多年中被广泛征引。

——加雷特·威廉姆斯 (Gareth Williams)

《高等教育研究》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SBN 978-7-301-13767-3



9 787301 137673 >

定价：33.00元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学术部落及其领地

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



[英] 托尼·比彻 保罗·特罗勒尔/著

唐跃勤 蒲茂华 陈洪捷 译

陈洪捷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5-56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部落及其领地: 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英)比彻,(英)特罗勒尔著;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大学之道丛书·第2辑)

ISBN 978-7-301-13767-3

I. 学… II. ①比…②特…③唐…④蒲…⑤陈… III. 高等教育—学术工作—研究 IV. G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4455 号

Tony Becher and Paul R. Trowler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 of disciplines

ISBN 0-335-20627-1

Copyright © Tony Becher and Paul R. Trowler,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for the quotation of short passages for the purpose of criticism and review,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or a licence from the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Co.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学术部落及其领地: 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

著作责任者: [英]比彻 特罗勒尔 著 唐跃勤 蒲茂华 陈洪捷 译

丛书主持: 周志刚

责任编辑: 刘 军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767-3/G·236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7.25 印张 200 千字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文版前言

探究学术与学科文化

陈洪捷

《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是英国知名学者托尼·比彻(Tony Becher)和保罗·特罗勒尔(Paul R. Trowler)关于学科文化的一部学术力作,多年来被有关知识社会学、高等教育组织与管理等领域的专家学人广为引用。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认为,与以往的政治、历史、经济、组织等高等教育的研究视角相比,比彻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另辟路径,别具特色。

比彻对学科文化的兴趣,缘于英国斯诺爵士1959年提出的“两种文化”的命题。在比彻看来,学术世界的版图中实际存在着数量众多且非常微妙的领域和边界,远非两种文化所能涵盖。很久之后,比彻从格尔茨的“学科民族志”研究获得灵感,找到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路径。比彻通过对英美两国18个机构中12个学科的220多名学者的深入访谈以及对大量相关文献的阅读,对学科知识与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细致而富有启示性的探究。这部用了七年时间才完成的著作已成为学科研究领域的一部经典之作。

总体看来,《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的研究有四大特色。第一,认识论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巧妙的结合,如比彻所说,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学科地域”(“学科认识论”)和“部落文化”(“知识的现象学”)的关系,其核心观点是,特定的学术群体组织及其学术生活的方式,与他们所从事的知识活动密切相关,学科认识论与学术文化之间有一种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第二,借鉴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如波兰尼、库恩、默顿等人的理论),构建其关于知识、学科和学术共同体



的分析框架；第三，借鉴了高等教育领域的相关成果（如伯顿·克拉克的理论），比彻十分重视后工业时代高等教育外部环境对于知识特征、学科边界和学术共同体生活的影响，同时也把教学与研究的关系、师生关系以及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构（如精英大学与社区学院）间的差异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考察因素；第四，在方法上，比彻同时使用了访谈和文献两种方法，而就访谈材料的运用而言，比彻进行的并不是文化人类学所主张的个案研究，他也没有运用深描（thick description）式的阐释分析。他喜欢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和提炼之后在中观层面上进行的一种概括、综合、贯通的研究，这与文化人类学反对抽象统摄、重视微观个体差异的路数也有所不同。

具体看，《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的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于认识和分析学科文化有突出的贡献。

学科知识以及类型

《学术部落及其领地》把彼此隔离、共同性少、交流也不多的各个学科共同体比作部落，他们内部共享着相同的信念、文化和资源，但与其他部落却很少往来。而他们形成部落的基础就在于他们是在同一块知识领地上进行生活与劳作，因此，知识的特性对于学科文化的影响显然是非常基本的。作者于是采用了不同于斯诺的分类方法，对学科的不同属性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界定。

作者参引了科尔布（Kolb）和比格兰（Biglan）对学科的分类体系，将学科分为硬科学/软科学、纯科学/应用科学，认为这种分类体系比较细致，而且简单易行，能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学术领域的认知特征，引向学术领域和研究群体的社会特征。比彻结合这两个范畴，提出了包含四个领域的知识分类框架：纯硬科学、纯软科学、应用硬科学和应用软科学。

纯硬科学指纯科学，以物理学为代表。这个领域的知识发展具有累积性和线性特征，知识结构类似晶体或树型；注重普遍性，用量化方法，注重简洁；强调客观性，不受个人价值倾向的影响，有清晰的正误标准；对现在和未来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能够达成共识；成果表现为某种发现或解释。纯软科学指人文学科（如历史学）和纯社会科学（如人类学）。这个领域的知识发展具有重复性，知识结构呈现为有机与整体的结构，可比作连续流淌的河流；注重特殊性、性质和复杂性；具

有个人色彩,价值观影响明显;知识的正误标准存在争议;对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缺乏共识;成果表现为理解或阐释。

应用硬科学指技术学科,以机械工程为代表。这个领域的知识发展目的性强,注重实用性,一般通过硬性知识获得实际技能;注重对物质环境的把握;采用启发式探究法;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判断知识的标准具有目的性和功能性;成果以产品或技术的形式呈现。应用软科学指应用社会科学,以法学、教育学、行政管理学为代表。这个领域强调知识的功能性、功利性,通过软性知识获得技能;关注职业实践,大量使用案例研究和案例法则;成果的形式为条约草案或程序步骤。

硬科学和软科学之间的区分是和范式存在的程度联系在一起的。硬科学和软科学的区分对应的是严密知识领域和非严密知识领域的区分。严密知识的范围一般比较清晰,研究的问题比较确定和狭窄,注重定量的问题,一般由因果关系命题、普遍的结论和普遍法则组成结构完善的理论。严密知识是逐渐累积发展起来的,呈线性发展特征,在提出新见解时往往不需要提供大量解释性导言。而非严密知识的特点恰恰相反,它可研究的范围比较宽泛,界限不清晰,问题的定义也不特别严格,理论结构也相对不确定,注重定性和特殊性的分析,在提出论点时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料铺垫。在方法论上,硬性的、严密的知识领域,往往是所选择的方法决定了问题的选择,而在软性的、非严密的知识领域,则往往是问题决定了方法。

而纯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区分是和对应用的关注程度联系在一起的。纯科学受知识本身的发展逻辑影响更多,而应用科学则主要由外部的实践需要所驱动。因此纯科学虽然更易于受到方法论漂移的影响,但基本上自我调节的(self-regulating),而应用型知识虽然偶尔会有学术漂移,但本质上更易受到外部的影响。

作者还提到结构强制型学科(contextual imperative)和结构关联型学科(contextual association)这样一对概念。强制性结构指逻辑严谨的一系列观点,每个新发现都可以毫厘不差地嵌入整体的图画中。关联结构指联系松散的一串观点,没有清晰的整体发展框架。这大致与硬纯学科和软纯学科这对概念相对应。

“学术部落”的特征

学术共同体是指致力于某一学科知识领域的学者群体，他们共享着某种价值和文化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也就是本书所称做的“学术部落”。在不同的学科领地上所栖居的学术部落必然会有许多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信仰及行为方式。比彻重点区分了“趋同与趋异”和“都市型与田园型”等学术活动特征。

所谓趋同与趋异，是指学科成员联系的紧密程度。趋同型（convergence）学科能够保持合理、一致的标准和程序，以便于进行知识控制，并保持稳定精英的存在。物理学是一个典型例子，许多物理学家基本上受过相似的学科训练，思维方式相同，有着共同的话语模式和可接受性标准，尊崇“深奥的简单”，对“自然的统一性有着准宗教的信仰”。此外数学和经济学也属于这一类。趋异型学科（divergence）在观点和问题上缺乏一致性，没有统一的范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容许知识的反常，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允许能导致自我毁灭的争论的存在。社会学属于趋异型的学科，它存在着多种范式，不大可能用统一的模式来对其进行归类，甚至有人认为社会学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科。被归在趋异型学科中的还有地理学、医药学、工程学等等。

所谓“都市型”与“田园型”，是用于说明研究人员与研究问题比率的高低。某一段时间内研究某个问题或某一系列问题的人数的比率高，就属于都市型研究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众多研究者聚集在一个狭窄的智识领域，围绕数目有限的一些问题，彼此交流频繁，比较容易形成共识，而所研究的问题通常在短期内可以得到解决。作者认为真正能够归入此类的学科实际上很少，只有物理学和生物化学。其他诸如化学、数学等学科，由于内部差异多，缺乏大规模合作，或者由于很多时候问题领域广、人员一问题比率不高，并不能算做是都市型。

田园型研究模式指人员一问题比率比较低，研究人员选择的研究领域比较广阔，问题分布离散，彼此之间较难形成共识，问题的完全解决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大部分学科如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等都属于此类。

这些分类有助于我们注意到学术活动的范围、种类的多样性以及与研究行为相关的系统差异，也为我们探究学科的认识论属性和学术共同体的社会特征之间的关系提供分析框架。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分类——不管是认识论方面的还是社会学方面的——都只是提供一种认识的维度，在对具体学科进行分析时，这些二元论的两级之间总是存在有中间地带，具体学科可以处在这个连续体的不同点上。而且，同一学科的不同专业领域可以属于不同的类型。

通过以上分类，我们对学科在知识本质上的差异，以及学术共同体的社会特征中的多样性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认知特征和社会特征创造了条件。

比如，我们可以发现，都市型只能在硬科学尤其是纯硬科学领域。因为在这样的领域，研究的前沿领域足够狭窄，问题定义足够明确，足以鼓励研究者聚集围绕在一个有限的智识区域。而软科学则由于知识间关联性弱，研究领域广泛而只能属于田园型。

但是，学科的“软/硬”和“趋异型/趋同型”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并不是硬科学具有较强趋同性，而软科学则趋同性弱。前者的反例有化学，后者的反例有历史学。化学可能会在相当大程度上由于依赖产业赞助以及高度微观和零碎的主题性质，而使化学学科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受到削弱，成为硬性—趋异的学科。而历史学虽然主要是“软性”的，但它也处于明显的矛盾状态，它之所以能获得一致性地位是由于借助于它对研究对象的无止境的开放，具有包罗万象的覆盖面，以及理论界线相对缺乏，因而成为软性—趋同的学科。

知识内容对学术共同体的影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从学者群体来说，在不同学科的研究中，参考文献与引文重要性不同；名望获得、学科精英的辨识、名声的认可及权力的应用各不相同。在不同探究领域，学术潮流的来源及形成方式不同；激进新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不同，语言风格、竞争模式、合作的本质和范围以及争论的后果等方面存在着系统偏差。从学者个人来说，招收新成员、发起研究活动、专业选择、博士生指导形式、学术漂移、研究效率和成果的巅峰状态、敬业精神等也有显著的差异。这有益于丰富我们对学术领域知识与学者群体关系复杂性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高等教育系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更多的外界因素进入到高等教育系统中来，大大改变了学术文化的特点。全球化、高等教育大众化、评估体系、市场化等等，都说明全世界范围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学科知识作为一种力量

的重要性在下降。“学术部落”来自外部的影响和干预越来越多，原本联系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变得松散，学术职业的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终身教职越来越少，学术职位更为细化，学术职业的灵活性降低，学者面临更多的管理与监督，学术领域的独立与尊严也受到影响。特别是随着学术领域内部学科分裂的加强，研究活动会越来越细化和专业化，彼此之间缺乏整合和沟通，甚至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与争斗，这都非常不利于学术的沟通与整合。如何在学科边界之间建立桥梁，促进学科的共性，保持共同体的独立性成为根本性的问题。在学术世界，不同的部落有着共同的种族背景，不同的领地寄居在同一块大陆之上。共同的语言有助于不同领地中的学者更好地理解自身以及他们对整个学术领域的评价，从而在抵御管理主义侵扰，抵抗不合理的强加的评价标准，在维护学术自治中，可以携手共同发挥作用。这也是《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的研究宗旨之所在。

2007年秋季学期，我在博士生研讨课上组织对这本书进行了一个学期的专题研讨，参加的博士生有沈文钦、徐守磊、秦琳、边国英、张存群、徐铁英、张琳，以及硕士生朱知翔等，他们每人负责一章，进行翻译和解读。后来我受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委托，对此书中文译稿初稿进行校阅，这些学生在其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给予我很大的支持，特别是沈文钦、徐守磊和边国英付出了很多努力，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感谢。

第一版前言



开始写本书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1959年,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我拜读了C. P. 斯诺的《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1959)一书,这本书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自己出身哲学,当时我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斯诺对自然学科领域和人文学科领域间的两极分化描述不够深刻,并且概念上有瑕疵。此后,我开始对学术界进行调查了解,发现这个领域里的界域远比斯诺所描述的更复杂、更微妙,并且,在斯诺所描述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大峡谷上,横跨着许多桥梁。

然而,20年后,我才真正明白如何进一步拓展我的研究,即去探讨学术领域范畴的多变性,去探讨这个领域中的学者的特点,以及他们是如何在这个领域中耕耘的。如果我得感谢那位物理学家写了《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使得我思考了这个问题,我更得感谢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给了我灵感,他比任何人使我懂得如何去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是他那尚未付梓的论文,“学科的人种论”(格尔茨1976,其中一部分重刊于格尔茨1983年出版的书中),促使我开始了调查研究,这也是现在这项研究的基石。

在确定了研究方法之后,我的机遇来了。我得感谢我曾任教的苏塞克斯大学。1980年,苏塞克斯大学给了我九个月的学术休假;我还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给了我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我在其伯克利校区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从事了三个月的研究。那段时间,我进行了实地调查,完成了我研究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随后的六年里,我又零零星星地做了一些工作,后来,我又得到从事研究的假期,再次到伯克利校区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完成了资料收集工作,并



研读了大量相关的基础知识书籍。感谢加州大学的多校区图书馆提供的便利条件，使我查阅到了广泛的文献资料。我积极认真地投入研究，两次获得纳菲尔德基金下设的社会科学研究小额资助基金，使我得以支付差旅费、打印费等研究开支。我还要特别感谢两位同事，一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伯顿·R. 克拉克，一位是瑞典高等院校国家理事会的埃斯基尔·比约克隆。他们给予我许多鼓励和支持，鼓励我积极探索拓展自己的新观点，并资助我写下了这些新观点。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恐怕难以坚持下来。

任何观点的产生、发展、成型仅仅靠闭门造车是不行的，交流、讨论才是真正的试金石。这下就“苦”了我那些长期帮助我、宽容我的朋友们。他们不辞辛劳，为我审阅本书拙劣的初稿。在此我要感谢：迈克尔·布莱克，罗杰·布林-斯托伊利，巴里·库珀，玛丽·亨克尔，埃里克·休顿，多萝西·杰罗姆，罗伯特·默里，特雷弗·佩特曼，谢尔登·罗思布拉特，马丁·特罗。他们对本书的风格、语言文字以及结构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根据他们的宝贵意见，我删除了初稿中的很大一部分，对其中一个重要部分的结构也进行了修改。我要再次对他们给予我的帮助表达我最诚挚的感谢，没有他们的辛劳、他们的支持，恐怕读者今天读到的版本就不是这个模样了。

我最初对学科文化系统研究的设想与现在这本书相差甚远。当时，我只是对6到12种不同学者进行描述，试图描绘出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特点，以及他们所从事研究的学科领域的特点。接下来的调查采访、资料收集，使研究变得更加明朗化：研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对不同学科领域进行比较、对比，不仅仅是对它们一一进行描述，而是应逐一进行分析。

我决定将注意力集中在跨学科间经常出现的、意义重大的问题上，这使我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开始显露出来，并逐渐清楚可辨，这时我收集的资料显然不够详尽了，在论据不够翔实的情况下，我无法对每个研究主题进行有力的阐述。特别是当我开始认真思考与知识本质相关的问题而不是与学术界的工作相关的问题时，我更无法进行有力的论证。要得出合理正确的结论，显然不能只依靠我自己收集的材料，还得广泛引用其他人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目前的主要依据有以下两种：一是源于自己采访不同学科学者的一手资料，二是源于各种各样的二手书面资料，希望在引用

这些书面材料时,我已明确地将自己的观点区分开来。相信读者能像我一样够清楚地区分这两者。采访材料主要出现在第四、五、六、八章;第一、二、三、七章更多地讨论了相关研究文献。绝大部分采访调查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我粗略估计,自然科学相关的调查,多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应用领域总和的一倍)。因此,自然科学似乎占了大量的篇幅。我想尽力改变这种现象,无奈我采访调查的材料使我不得不如此。

对热衷研究方法论的读者来说,我已在附录里附上现场调查数据以及本研究长期调查的方法及模式。值得一提的是,我要感谢我所采访的每一个相关领域的学者,是他们使我对学科领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是他们的观点、理解、经历使我加深了对不同学科的理解。我一共采访了两个国家(英国和美国)220多位学术界人士,跨越了12个学科、18个机构。我要衷心感谢我所有的采访者,感谢他们无私地奉献出宝贵的时间,感谢他们毫无保留地对我的采访所作出的回答。

托尼·比彻

第二版前言



应邀修改出版本书第二版——也就是现在这个版本——使我们有机会反省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十多年来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使我们有机会考虑这些变化对学术部落和学科领地的内在影响。诚如第一章所论述的那样，从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到 90 年代，学术部落和学科领地已发生了本质上的根本变化。在准备第二版时，我们给自己规定的一项任务就是，着重于学术部落对这些环境变化的适应：有些适应是迫不得已，有些适应是积极响应，而有些适应则是潜移默化的。另一项任务是将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融入本研究中，而第三项任务是对本研究最初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考察这些假设在这样的变化环境中是否还具有生命力。

克拉克夸大了本书第一版的论点，他认为第一版主要讨论的是各学科的知识主体“决定研究个体和系科的行为”（克拉克，1997：24）。这种决定论的观点与我们现在的观点相去甚远。全世界高等教育系统的变化，意味着作用于学术部落的力量在实力和数量上都有增长，这增强了影响因素的外在论特性，而非内在论的特性。评估体系、务实的趋势、对“金钱的追求”，这些足以说明全世界范围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态度上所产生的重要变化。学院统治的衰落（哈尔西，1992）意味着学科知识作为一种力量的重要性在下降。

同时，高等教育体系的变化，大学内部结构的改变，以及高等教育意义本身的变化，导致了这样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这个学术体系内部差异极大，相互之间有较强的渗透力。在此系统中，通过学术研究活动与学科核心知识紧密结合，这只是众多学术活动的一种。对许多



学术界人士来说,这并不是他们工作中最有意义的一部分。人们还会常常提起象牙塔这个字眼,但这只会引起几乎每个大学教师的一阵嘲笑。

似乎使这种变化更为加剧的是,目前的理论研究重点已经转向了科研活动、价值观、科研态度的形成及其表现,这部分是受到这种学术趋势的影响。后结构主义者强调社会结构中的个体与整体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在过去20年里,这个观点对高等教育体系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启示——虽然这种启示在别的研究领域更为广泛(特罗勒尔,1998a; 普里查德,1999)。我们概念化知识的方式——或更具体一点,知识能力(knowledge ability)——今天可以这样理解:认识论的形式本身受控于社会的诠释和建构,因此,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关联性也就显而易见了。

这种变化受到了质疑,现在人们更加关注在发展非常具体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活动中微观社会的变化过程(格拉迪,2000)。从这个观点看,对特殊研究方向中学者的学术活动进行概括是很容易引起争论的。

因此,强调认识论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会受到两方面的挤压:现实世界的变化和理论的转向。一如学术界人士自身一样,他们所宣称的例外论,在后现代主义解合法化(delegitimation)的当代语境下,不再有同情的听众,学科知识的“特殊”性意义尽管还没消失,但已经大大减小;在理解学术职业时,学科知识仍是一个重要的产量因素,但我们要用与以往稍微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种因素。

本书旨在探求学术文化(即“部落”)和学科知识(即“学科领土”)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征,所以没有详细讨论高等教育体系里影响学术文化的其他因素。然而,我们最初想探讨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认识论的因素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会随之改变。假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体系里就一直存在着多样性,我们同样想引入比第一版更为丰富的资料,不再严重依赖对精英团体研究的结论,而是采用更多来自地位更为低下的院校和系科的材料。

然而,我们并不试图写一本全新的书,因为第一版数据丰富,见解精辟,所以相当成功。保罗·特罗勒尔收集了大部分的新材料,没有忘记第一版的学术价值,没有忘记第一版流畅的文笔。因此,他在修订时非常谨慎,除了第一章是全新的一章之外,其余的章节大体保留

了原来的结构。我们在恰当的地方融进了许多 1989 年以后的参考资料，删除了一些几十年以前的研究资料。然而，我们还是保留大多数原来的引文，因为，它们为第一版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我们希望，我们远没有根本改动——或更糟的，损坏——原作，而是更新和保留其精华，并增加了一些读者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最后，我们要额外感谢一些人。我们要感谢开放大学出版社的约翰·斯凯尔顿，他对我们的工作一直给予热心支持和帮助。我们还要感谢高等教育研究学会的艾玛·桑斯特，她为我们提供了较准确全面的英国教师和学生的最新统计数据，这对更新本书的数据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帮助。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家人，他们最懂得我们这项研究工作的艰辛和意义。

保罗·特罗勒尔

托尼·比彻

缩 写 表



AAUP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
AUPSW	大学教授社会工作协会
CVCP	The Committee of Vice Chancellors and Principals (UK) (英国)校长和副校长委员会
DES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cience (UK) (later reorganized into the DfEE, see below) 英国科教部
DfE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UK) (later reorganized into the DfEE, see below) 英国教育部
DfEE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英国教育及就业部
ESRC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
FRS	Fellow(s) of Royal Society 皇家协会联谊会
HEFC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
HERI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USA) 美国高等教育研究院
HESA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UK)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信息交流技术

